

● 书 评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 历史思维评说

夏 冠 英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夏冠英(1958-),男,湖北黄石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6-0784-02

崇尚理性的历史观以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在心灵重演过去的思想。这种“重演”便是历史思维。单波教授著述《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单著),亦是对中国过去百年传播思想的重演。作为历史思维,我们以为,它在思维视界、方法诸方面都对传统相关思维有所突破,值得作推介性评说。

单著历史思维视界是世界性的,它把中国近代新闻业产生与发展纳入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历史过程思考,其思考突破国家民族界域。这一视界源于它历史思维的整体观,这一整体观内含两个层次:一是国家史与世界史相联系的整体观,单著表述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信仰方面与世界发生了广泛联系”;一是专业史与世界史相联系的整体观,单著表述为:“一部中国新闻史正是中国进入交往时代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单著思考中国新闻业世界性视界,其实是这两个层次的历史整体观有机结合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单著是基于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史转变”观点展现其历史思维整体观的,由此可说:它世界性视界最深远思想源泉便是马克思历史观。从学术旨归看,这一视界又来自单著致力追求历史真实的“史家精神”。这种精神可从它对传统新闻史体例及做法的反思见出。传统新闻史或按政治运分期来排列史实,或把新闻史视同纯粹事业史,单著以为,这些体例或做法视界狭隘,体系封闭,都未能充分认识到新闻是人类历史性存在,都未能从新闻本体结构去发现它生存的现实之基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反思透出的正是单著世界性视界的精神资源:以求得历史真知。

具体说,单著世界性视界为的是其历史思维可能与历史真相同态,以逼真重现它认为的新闻发生与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类物质与精神交往的需要。导论部分将中国近代新闻观念及新闻业纳入世界性视界观照,结论是:“中国媒介既是中西文化传播产物,又是中西文化传播中介。”这个结论正是对新闻发生与发展现实基础的总括性重现。中西文化传播就是满足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交往的需要,中国媒介由中西文化传播产生与因中西文化传播发展(成为中介——世界文化交往核心),就是产生与发展于人类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交往的需要。作为出自一种世界性视界的思维成果,为了学术上的谨慎,不必去说这个结论就是历史真知,但较之政治视角外在地看待新闻发生与发展,它一定是个力图感应新闻自身律动的历史发现;较之事业史视角简单地看待新闻发生与发展,它一定是个力图把领中国新闻世界性生成与发展的复杂性的历史发现。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要透过历史实在(事)对其虚在(理)作出思考。单著的思考,分别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诸方面展开,但这多维思考的归依却是这样一个它以为治新闻之学所要关注的终极问题:新闻为何不自由?新闻如何能自由?这表明,单著把历史上针对新闻不自由之因所出现的排除之径视为新闻发展的基本道理(逻辑),而把新闻自由视为寻找这种道理的学术目的。单著认为,历史上新闻不自由之因主要是“新闻传播受制于专制力量,沦为政治附庸与手段,新闻观念与政治理念相附和”等等,而排除这种不自由之因而至达相对自由之径,是那些曾以新闻为业的历史人物突破专制、追寻自由的种种观念与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厘析新闻不自由之因,单著并不是一种纯然否定历史的单向思维,而是依据特定的历史条件给出一种客观的、“同情”的理解。论说“党报本位”观念给新闻业带来的对“新闻本位”的偏离,

它肯定这一观念的思想渊源“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之于“新闻自由”的价值，指出是非市场化经济体制促成了其中的“一元化”新闻观的膨胀。此类多维思考所形成的思考品质的客观性与同情意态，使它厘析出的“不自由之因”也有了迎受真理性认同的可能性。以众多历史人物追寻自由的新闻观念与实践展示新闻自由之径，单著思维注意从它们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两个维度辩证地展开。如论邓拓，它肯定了邓的社论写作主张的群众观点，以表述后来的“文革”社论“代圣立言”与之相背离的历史遗憾，来呈示它之于新闻发展趋归于“新闻本位”的意义，同时，也指出邓那代人的局限性：“以政党学说否定资产阶级新闻观虚伪性的同时，也把新闻业的规范给毁弃了”。这类辩证思考都体现于穆青、范敬宜、范荣康等人物的论说。我们说，局限是历史进步的需要，进步是历史的归程，兼容进步与局限的辩证式历史思维，是思维规则对历史规则的同态反映，因为同态，这种反映堪称逼真的反映。

单著以为系列“以新闻为业”的人们突破专制、追求自由是新闻发展的历史逻辑，是就新闻自身的历史运动展开的思考，比较传统的相关思考总把新闻发展与政治斗争作简单的因果联系，至少可以说，单著的思考更为深刻地进入了思考对象本体。作为单著历史逻辑思考的基本主题：新闻为何不自由？新闻如何能自由？本身是对新闻本体性问题的拷问，而且，它所意味的单著思考历史逻辑的学术旨归——为了新闻的自由，实际是对中国新闻业历史命运一种终极性关怀。传统的把新闻演变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思考，或许能解说特定时期新闻演变现象，但它一定不能超越“解说”呈示这种关怀。

这种关怀出自单著为自己标树的“走进历史又超出历史”的治史理念。这个理念在单著的具体表述是：要通过史的清理与价值发现，弄清“中国新闻业该怎样存在”之类关乎中国新闻前途问题。概而言之，透出单著历史思维的未来中国新闻的理想是回归“新闻本位”，这在思维的宏观层次，除了体现为上述以“新闻如何不自由，新闻如何能自由”作为思考历史逻辑的基本主题，还体现为以它为基准划分史段：30年代以后走向“新闻本位”，49年以后偏离“新闻本位”，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趋近“新闻本位”。这里，“新闻本位”其实是单著整体性历史思维纲领，而作为纲领，其显要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呈示，而这种价值呈示亦是为未来新闻业导航。在微观层次，这体现为它将“新闻本位”作为历史取材标准：凡它论说的人物或向往、执守“新闻本位”，或其言动与“新闻本位”相关；凡它论说的人物言行都紧扣“新闻本位”，或充分挖掘其中“新闻本位”因素，或仔细剖析非“新闻本位”因素。另外，它还体现为以“新闻本位”作为历史评价标准：一个历史时期的得失，一个历史人物言动的功过，它们的甄别与判定，决定于它们“在”还是“不在”“新闻本位”。汉奸报人管翼贤新闻业务观念含有“新闻本位”成分，单著对他的评说就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新闻本位”作为历史取材与历史评价标准，同样是单著以对“新闻本位”价值的衡定来提示未来中国新闻业发展方位。

单著的历史思维虽然有着高阔的视界，但它厘析历史逻辑，致思的对象通常是历史的微细颗粒，而由此思得的却是潜隐其间的壮阔的历史精神与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嬗变，体现了微观入手、宏观把握的思维特征。且看它对文化逻辑的厘析：梁启超自由放纵、感情充溢的话语体式，是资产阶级救亡图存、奋发求变的精神的显影；“五四”期间自由洒脱、开放灵活的文体范式，基于那个时期科学民主、崇尚个性的文化立场；新闻叙事偏重于教化功能，源于“文以载道”的千年文化传统；而当代新闻叙事的人文气息，则是因为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文化观念的转型：曾被严重忽略的人的价值得以肯定与珍视；如此等等，都是小中喻大，微中见卓，都是从历史的微细根须去感领与把握历史的大动脉。必须说的是，铺陈历史逻辑，解说历史因由，如果是作方法论上的敷衍，可以借用既有的也是通行的泛泛之论，但单著即由自己深入到历史实在的细部去勘察、去寻求，这种理论方法的选择与实施，应该说是求真求实学风的体现。

总之，单著历史思维从人类物质与精神交往需要厘定百年中国新闻世界性生命起源，从系列代表人物向新闻自由奔进判明百年中国新闻生命历程，从呈示“新闻本位”价值提示中国新闻未来走向。虽然，在单著历史思维，观念多于史实，义理胜于考据，作为“应用卷”，如果有更多映照实务观念的实务史实，其“应用”品性可能显得更为鲜明突出，但，因它在思维视界及方法的突破形成了它“义理”之新，它思考的执著与深入形成了它“义理”之深，它多维的或辩证的思考形成了它“义理”之稳，它依然能够较好地回答中国新闻理论与实践若干历史与未来的问题。

（责任编辑 车英）